

国际政治

战争的演变：从寻求生存必需到维护生存质量

潘亚玲 张 春

〔摘要〕 依据其主要目的或动机,可将战争大致分为寻求生存必需型与维护生存质量型。寻求生存必需型战争的参战方根本目的在于,寻求更多的生存必需资源以缓解甚或消除其生存必需稀缺,因而以地缘为决定因素的传统领土安全观占主导地位。根本地由于技术、经济及社会变革,维护生存质量的战争中至少有一参战方目的在于维护自身或某部分人类的生存质量,它更多地由一种国际自由主义及人类安全观所决定。意识形态战争的大规模兴起直至二战结束基本完成了这一历史进程,其后,维护生存质量就逐渐成为战争的惟一或主要目的——虽然这存在重大政治和伦理困难。

〔关键词〕 战争;寻求生存必需;维护生存质量;技术、经济及社会变革;政治与伦理困难

〔中图分类号〕 D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02)04-0014-21

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条途径的继续”,^{〔1〕}虽然其目的或动机复杂多样,但仍可大致将其划分为两类(虽然这种划分未必精确且尚有待进一步探讨):一类在于寻求生存必需,另一类则重在维护生存质量。主要由于技术、经济等原因,寻求生存必需型战争的目标集中于寻求更多的生存必需资源,以解决主要来自人口增长、自然灾害等的生存必需资源稀缺。随着技术革新、经济发展及社会变革,人类基本生存必需资源稀缺问题基本解决,战争主要目的日渐转向维护一国人民或某部分人类的生存质量,其最为明显的当代体现包括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人道主义干涉以及反恐怖主义战争等。从寻求生存必需到维护生存质量,战争的演变历程缓慢且艰难,其中技术革新、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变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两种类型的

战争间的宽容与不容异己则构成了一幅幅生动且深刻的国际体系演变的动画。

—

卢梭认为,在前政治社会的自然状态中,自然资源相对人口极为丰富。人人自爱(amour dex soi)且完全平等,这是一种幸福、和谐的自然状态;由于人口增长及经常性的自然灾害等,自然资源不再充足、私有财产出现,由于生存必需资源稀缺及公共权威的缺失,人人自爱演变成为人人自私,幸福、和谐的自然状态逐渐演变为相互竞争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2〕}类似地,在其得以全球普及之前,主权身份的获取往往只限于欧洲及北美少数地区,根据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定义的主权自由放任原

则,广袤的亚非拉成为主权扩张的充足“自然资源”,这时主权国际体系并不存在生存必需资源的稀缺,因而总体和谐;随着主权扩散,稀缺逐渐出现,如同个人生存必需资源一样,国际生存必需资源的争夺也随之出现了。

对于生存必需资源的稀缺,有两种解决方法。第一种是和平的,即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生产率等手段使现有生存资源能产出更多、更为丰富的生存资源。但在资本主义产生、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前,整个世界的技术与生产力水平很低,经济以自然经济为标志,村庄或家庭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少有工商业中心城市,国家间经济几乎完全隔绝。^[4]技术、生产力的低下决定解决生存必需稀缺只能依靠生存必需量的积累而非质的提高;出于同类原因,决定了生存必需资源的核心是土地,因为更多的土地意味着能养活更多的人口,并可能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提高。^[5]因而,寻求生存必需量的积累最为主要的方法是获取更多的领土。这一方式可能是和平的,但更多是暴力的。在世界上尚剩余未开发或未有“法律”先占者的情况下,殖民扩张基本可通过和平方式实现、或至少不需大规模使用武力,无论古希腊时代早期的希腊人殖民活动还是紧随航海大发现之后的早期欧洲海外殖民都是这样。^[6]迅速殖民导致稀缺迅速出现及殖民地人民因知识扩散而唤醒的对生存必需的保护和重新争取意识,从而使生存必需资源的获取不再可能和平获得,寻求生存必需战争诞生了。

公共的世界政府和确切的世界道德的缺失导致争端极少可能仅诉诸于理性和公正就能得到解决;战争因而成为解决争端的最为有效的方式和世界政治的最终裁判;一定程度上,世界政治就是权势政治且其最终表现形式是军事力量。^[7]在以土地为经济和政治权势基石的传统社会中,寻求生存必需战争一旦成功,便将有极为明显的收益:获取对能直接增加经济和政治权势的领土——包括额外的土地及与之相

联的劳动力——的控制,这能导致一国国力显著上升甚至发生根本性变化。^[8]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对英国的霸权极具决定意义,它获得了密西西比河以东和加拿大的法属美洲领地,并使法国在印度只能保住几个商站,从而使英国一跃成为最主要的世界强国。^[9]通过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普鲁士腓特烈大王从死对头奥地利手中夺得了富饶的西里西亚,进而跃升为德意志世界的领袖,部分也源于这一胜利的历史记忆,统一后的德国持续坚信可通过寻求生存必需的战争而最终成为世界霸主,^[10]普鲁士这一胜利的历史意义远不仅限于德意志。

寻求生存必需型战争首要地由技术、经济等的发展水平不足以提供对生存必需稀缺的质的替代方法所决定,并因由此而来的社会观念而得以强化。其根本目的在于获取更多的生存必需资源、尤其是土地,以缓解甚或消除因人口增长、自然灾害等带来的生存必需稀缺——尽管这种稀缺可能只是幻象。由于战争往往在争夺生存必需资源的各方间展开并主要为着夺取更多土地,因而地缘成了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拥有良好的防御地位或较佳的内线作战优势,往往是从战争中胜出的关键,英、法、德、俄等的崛起与衰落都证明了这一点。^[11]同样由于技术、经济等条件限制严厉,以及旧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不可能动员大规模的人力、物力资源,寻求生存必需型战争总的特点是有限与相对温和。^[12]这种战争还导致一种当今仍据显赫地位的传统安全观:安全就意味着领土不受侵犯,人民(或公民)的最终认同及忠诚往往必须维系于统治该领土的政府权威身上,并为民族国家的形成和维持提供重要的心理与物质基础。^[13]

二

自人类历史进入意识形态斗争时代以来,战争的作用就逐渐向维护或推广一国所认同或

倡导的某种价值观念体系扩展,并逐渐演变成成为主要维护生存质量的新型战争。^[14]在这一演变历程中,技术革新、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变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到1870年已深刻改变了世界政治的基本面貌,并关键性地削弱了土地在人类生存中的作用。^[15]技术革新及随之而来的生产力大幅提高,使当前和未来的诸多最为重要的问题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取决于谁占有一块领土,而更取决于它在这一领土上做了什么。更多的“生存空间”已不再必需,因为居住已城市化;农耕地也并不需要更多,因为农业生产率大为提高且农业人口比重大为下降;原材料因附加值少而价值降低;现代武器也使传统“战略纵深”意义相对下降。^[16]最为重要的是,领土扩张的替代品现在更具吸引力:前工业化时代,不断增长的人口最后会导致投资的边际效益递减及生活标准的停滞不前,获取生存必需的惟一道路是获取更多的领土;技术革新提供了一个摆脱此困境的最佳方法:国内生产扩张显然比国外征服更为迅速和安全,且即使一国并未拥有工业经济的所有必需品,贸易也比帝国主义更为低廉和容易。^[17]

战争技术的革新,尤其是核武器的诞生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总体战诞生后,战争实质是国家间的资源、经济大战,这更取决于在领土上干了什么而非占有多少领土。^[18]核武器的诞生几乎致命地削弱了土地的作用:由于其巨大的毁灭性,使曾经提供了免遭毁灭性袭击的空间和时间因素在核时代完全失去其防御功能。^[19]同时,从长远看,核武器倾向于使权势的传统基础——领土、人口、工业能力等——的重要性模糊化,并进而缩小而非拉大大国与小国间的差别;……在前核时代,小国不太可能对大国施加不可承受的伤害而能独善其身;但并非完全不可想象的是,在不远的将来,一个武装着核武器的小国可能据有施加此等伤害的地位。^[20]

更大的社会变革从另一个方面促进了战争的演变。在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革命之后,政治合法性的根本基础改变了。^[21]民族主义与大众政治日益兴起并逐渐成为一国合法性及其对外政策的决定因素,它为国家提供了有效行使权力、发动战争并同时保证人民愿为国家提供必需的人力与物力资源的重要手段,并成为国家的政治、军事、外交权势。^[22]正是这种社会变革,使得一场迅速的、军事上决定性的战争也可能不会带来任何胜利果实:因为现代社会可能远比现代政府更难以征服;而且新征服地对征服者生存必需的增加与否、增加到何种程度等都是值得怀疑的。^[23]

而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大大加快了国际法对于战争寻求生存必需目的的否定和维护生存质量目的的肯定。从国际联盟盟约开始,经1928年凯洛格——白里安公约(非战公约),最后到联合国宪章,战争终被区分为正义和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是非正义战争,应予以禁止或受国际社会制裁;自卫战争和对侵略国的集体武力制裁(皆可视为维护生存质量的战争)则是正义战争,所有爱好和平和遵守法律的国家都应予以支持。^[24]

巨大的技术、经济、社会变革导致一国(国家集团)为维护自身生存质量不致遭受可能导致严重下降的打击、或出于对全人类生存质量的某种最低标准的关切,^[25]与可能导致这种威胁的另一国(国家集团)展开了一种新型的战争——维护生存质量型战争。根本上讲,这往往缘于战争双方的根本认识差异:一方可能认为必须通过寻求生存必需或破坏另一方生存质量才能提高、改善自身生存质量,如领土侵略、恐怖主义、种族歧视甚至种族清洗等;而另一方则要维护自身现有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体系不受损害,或防止某些达到触犯人类良知地步的行为。因而,这类战争就大致可涵盖从自卫战争、防止国际霸权、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人道主义干涉直至反恐怖主义战争等总体上被当今国际

社会认为是正义的战争。现在,战争的决定因素已不再是地缘,它已为一种正日渐回归的国际自由主义、国际正义观念所替代;^[26]传统的领土安全观正遭受一种更为全面、高级、并经常可能超越民族国家的“人类安全观”(human security)——它不光注重一国领土安全,还注重一国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环境安全、社会安全、人类发展、人权等——的愈益严峻的挑战。^[27]

三

简要理论分析之后,让我们将目光转向历史,观察漫长而又艰难的战争演变历程。

从寻求生存必需到维护生存质量,战争的演变历程大致可追溯至意识形态斗争的较大规模兴起。^[28]源自意识形态斗争的首次大规模战争便是开启近代国际关系的1618—1648年三十年战争。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新教兴起动摇了天主教在欧洲的统治地位及其他利益——即导致天主教生存质量下降,而由此导致的天主教对新教的镇压与迫害则使新教徒认识到自身生存质量因信仰而下降,为维护各自的生存质量,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结果是主权国家得以创建并保证了新教与天主教分属不同的主权国家,双方生存质量都得以维护——虽然天主教生存质量可能有所下降。^[29]某种程度上讲,美国独立战争也具有与三十年战争类似的意识形态战争性质。美国革命“又重新掀起关于意识形态的冲突。……虽然人们不愿在军队中服役,但他们能够立即奋起抗敌保卫自己的家乡。”^[30]而漫长的冷战也是一场被赋以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间的维护生存质量型战争——虽然它并未演变成为本文重点讨论的“热战”。^[31]

均势战争实质上也是维护生存质量的战争。经典均势的要义在于维护列强间权势大致均衡的分布,阻止一强取得压倒性优势或霸权,通过保证所有强国的独立生存和体系结构的多

元性质从而维护体系内近乎所有国家的基本生存质量。^[32]均势制衡者的初衷往往首先是维护他国的生存且其主要目的并不在于获取新领土——虽然也存在此类动机。正是通过均势战争,法国的霸权图谋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被阻遏,腓特烈普鲁士在七年战争中未遭灭顶之灾,欧洲协调为法国预留了一席之地,一、二战后的德国及二战后的日本能够迅速恢复。^[33]

战争从寻求生存必需到维护生存质量的演变的真正集中的体现是拿破仑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两种不同类型的战争间的不容异己由此逐渐走向顶峰并基本完成了整个演变历程。法国革命一开始是法国内部的革命招致旧制度的干涉并严重威胁到法国生存质量(法国险遭灭顶之灾),拿破仑的战争迅速地将这一情势颠倒了过来:现在是法国威胁到欧洲的生存质量而非相反。这招致整个欧洲联合反霸、维护自身生存质量的战争并粉碎了拿破仑的野心,当然也为法国留有相当的生存质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国或少数国家的寻求生存必需的努力威胁到了体系内其他国家的基本生存质量,战争成为一场寻求生存必需型与维护生存质量型战争间的生死搏斗,并以寻求生存必需型战争逐步被逐出历史舞台为结局。“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大加速了那些依旧顽执旧有战争观念的等级制精英制度的衰亡。两战期间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更巩固了这一认识,并接受保证大众福利为国家的一项主要职责。”^[34]至此,维护生存质量逐渐成为战争的主要目的并成为战争继续存在的一个重要依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维护生存质量的战争主要体现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人道主义干涉、反恐怖主义战争等。作为一个准“世界政府”,联合国自成立以来密切关注全球局势,经常为着维护地区稳定、保证当地人民生存质量的目的而介入地区冲突和战争,最为显著的是1991年海湾战争。可以说在当今维护生存

质量战争中,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占据相当比重并为全人类生存质量的维护、甚至提高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35]

社会主义国家开启了对“人与人之间没有性别、种族、肤色和阶级等歧视的互相平等的道德上的深切关注”的国家实践的先河。^[36]到20世纪、尤其是其后半叶,基本上与此类似的“国际关切”迅速蔓延,其最为显著的体现是有关人权及由此而来的人道主义干涉与反恐怖主义战争。自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开始,人权国际规范到20世纪末已被广泛认为已取得不容违反、不容置疑的普遍国际法规范(jus cogens)的地位,^[37]导致由此而来的国际人道主义干涉在二战后、尤其是冷战后显著增加;而另一类更为明显地破坏一国生存质量、严重违背人权国际规范的国际恐怖主义,更无疑地成为国际社会维护生存质量战争的目标,“9·11”事件后国际社会对阿反恐怖战争可谓是其最佳范例。

战争从寻求生存必需到维护生存质量的演变历程是一个两类战争相互宽容与不容异己的历程。^[38]如同上述理论分析和历史考察所展示的,两者有着截然区别的动因、目的、特征及观念支持,因而其不容异己是必然的、同时也是显而易见的。更应关注的是其相互宽容,因为这不仅体现了两者间的相互承继关系,还体现了维护生存质量型战争所采纳的寻求生存必需型战争的手段、目标以及观念等。应当承认,尽管维护生存质量型战争可能主要出于维护一国或某部分人类生存质量的目标,但其中必然隐含了执行国家的若干隐蔽的寻求生存必需的努力,这就必然地涉及到维护生存质量型战争的未来及其政治与伦理问题。

四

战争演变的根本动力在于巨大的技术、经济与社会变革,正因此才可能建立“人统治自然

的帝国”(the empire of man over nature)取代“人统治人的帝国”(the empire of man over man),^[39]使战争不再主要为了寻求生存资源。自16世纪、特别是19世纪以来,随着欧洲的扩张,世界一直经历着全球化进程,目前的全球化不过是这一历史进程的继续与飞跃。全球化进程至少有三大结果促使维护生存质量日益成为战争的主要甚或唯一目的,并将继续强化这一历史趋势。首先是作为从事现代战争和经营现代经济的现代国家迅速扩散至大致整个世界。^[40]主要由现代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的拓展与深化,更进一步加深了这样一个认识:即国际无政府状态决定国家只能享有“相对安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自由放任”原则只是一种法理原则而非实际原则。^[41]其次,现代国家间的相互依赖日益密切,导致国家行为变得较以前更有预期,^[42]并大大增加了寻求生存必需型战争的可能代价、减小了其可能收益。最后,由于诸多超越民族国家管辖范畴的安全问题出现,安全观念逐渐由传统的领土安全观转向更为全面和复杂的“人类安全观”。

然而,旧有战争形态并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其根本原因仍是稀缺的存在。正如奥姆指出的,虽然经济、技术的发展使建立“人统治自然的帝国”取代“人统治人的帝国”成为可能,技术革新、生产力提高可能没有上限,但自然资源、尤其是饮用水资源极为有限,一旦“人统治自然的帝国”不再可以轻而易举地加以扩展,一个民族提高其生活标准的惟一渠道便是将其他民族的资源或工业成果重新分配到自己手中,寻求生存必需的战争又将重返国际体系,^[43]阿以间持续不断的战争、1991年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等都是其具体体现。

尽管维护生存质量可能成为未来战争的主要甚或惟一目的,但这一类战争的成长面临着重大政治和伦理困难。就政治困难而言,由于其根本动因在于技术、经济及社会变革——就今天而言具体是全球化进程,因而在全球跨国

经济中占据巨大优势并由此助长或支撑其在整个世界技术、军事、政治乃至思想文化领域占据主导或近乎主导地位的国家——当今是美国——会明显地让人注意到一种近代国际关系诞生近400年来几度重现的局面,即一个超级强国多少威胁着主权国家间国际社会的存在,多少倾向于将其转变为一个“普遍帝国”。^[44]这将会从另一个方面威胁着世界其他国家的生存质量,损害着最基本的国际正义,即各国的独立自主。而当前美国的种种举动,诸如科索沃冲突、打击阿富汗的反恐怖战争等都暗示着这一危险倾向。维护生存质量战争所面临的政治问题还在于它究竟可能、或实际地掺杂了多少此类战争的主导国家的寻求生存必需的努力?根据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所导出的结论,无论国际社会将如何向正义与公正方向发展,最终决定国际社会基本面貌的仍是权势,因而无论维护生存质量的战争将如何成长,它也必然隐含了主导此类战争的国家的若干隐蔽的寻求生存必需的努力,尤其在为非本国生存质量而进行战争的场合,这样的战争从来都是大国替小国主持“公道”而非相反、也不可能相反;由此,这种战争的成功与否更多地取决于大国的介入的意志与程度——而这又取决于大国对这种介入的可能获益、也即能在多大程度增加其生存必需的计算。因此,维护生存质量的战争中掺杂的大国利得将是其成长的重大障碍之一。最后,维护生存质量的战争还面临一个主导国将这种战争无限扩大化并进而寻求绝对安全的问题,拿破仑战争、第一及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明显具有这一倾向,而最为明显的当属目前美国可能的无限扩大其人道主义干涉、反恐怖主义战争的努力。

从伦理道德上定义对一国本身生存质量的威胁相对简单,因为出于反抗侵略的自卫往往容易获得国际体系内多数成员的认同。但它也存在一个日渐上升的问题,即如果这种对一国生存质量的威胁来自一些并非那么显而易见的

军事侵略——或者说来自非对称性攻击,如美国当前定义的来自“无赖国家”、甚至是“邪恶轴心”的威胁——时,应当以什么样的标准判定这类威胁、确定其实施者以及其可能伤害程度呢?同样的伦理问题也存在于当前正酣的反恐怖主义战争中,如何定义“恐怖主义”与“恐怖主义国家”以及如何判定恐怖主义行为的后果等都是相当困难且无以量化的难题,当前印巴、巴以冲突也正因此而更为复杂。与此相对,如果一场战争以维护国外某部分人民的生存质量为目标——如人道主义干涉、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等,那么判定确实存在对这部分人民生存质量构成威胁的标准是什么、由谁判定此种威胁、由谁实施战争以及谁授权实施战争等问题也显然极具伦理挑战;如果这些挑战中任何一项不具极强的说服力都将导致国际社会的严重质疑,海湾战争后对伊拉克的持续制裁及不断打击、科索沃冲突等都是这方面的显例。^[45]

[注释]

- [1]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M],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1页。
- [2] David P. Fidler, “Desperately Clinging to Grotian and Kantian Sheep: Rousseau’s Attempted Escape from the State of War,” in Ian Clark ed., *Classica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St. Martin Press, 1996), pp. 122-123; 列奥·斯特劳斯、约翰·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M],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49—652页。
- [3] Lynn H. Miller, *Global Order: Values and 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nd edition (London: Westview Press, 1990), pp. 29-32.
- [4] John P. McKay et al., *A History of Western Society* (Boston: Issaca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595-609, pp. 796-801; 张跃发、刘养浩:《民族国家与世界经济:1500—1900》[M],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118,365—370页。
- [5] Carl Kaysen, “Is War Obsolete? A Review Essay,” in Sean M. Lynn-Johns ed., *The Cold War and After: Prospects for Peace* (Cambridge, Mass.: The

- MIT Press, 1991), p. 88.
- [6] David H. Zook, Jr. and Robin Higham, *A Short History of Warfare*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67), p. 33; 时殷弘:《新趋势、新格局、新规范》[M], 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 第9—11页。
- [7] John Orme, "The Utility of Force in World of Scarc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3 (Winter 1997/1998), p. 138.
- [8] Kaysen, "Is War Obsolete? A Review Essay," p. 88.
- [9] Zook, Jr. and Higham, *A Short History of Warfare*, p. 114.
- [10] "1914年当德国迫使自己和他人走向战争时,他们期望的是一场与自1815年来他们所经历的无甚区别的战争。"同注[5], p. 88.
- [11]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M], 求实出版社, 1988年版, 第102—119页; 时殷弘:《新趋势、新格局、新规范》, 第三章。
- [12] K.J. Holsti,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3rd edition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Inc., 1977), pp. 58-59; Zook, Jr. and Higham, *A Short History of Warfare*, p. 101.
- [13] Walter C. Opello, Jr. and Stephen J. Rosow, *The Nation-State and Global Order: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Politics* (New York: Lynne Rienner Publisher, 1999), pp. 28-31.
- [14] Michael Howard, *The Causes of Wars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Temple Smith, 1983), pp. 36-48.
- [15] 时殷弘:《新趋势、新格局、新规范》, 第1—3页。
- [16] Richard Ullman, *Security Europ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23-27.
- [17] Orme, "The Utility of Force in World of Scarcity," pp. 143-145.
- [18] "毋庸置疑的是, 在一场大国间(通常是联盟间)的长期战争中, 胜利往往属于有坚实的经济基础的一方, 或属于最后仍有财源的一方。"肯尼迪:《大国的兴衰》, 引语见"前言", 第11页。
- [19] Holsti, *International Politics*, 3rd edition, p. 311.
- [20] Ibid., pp. 313-314.
- [21] Kaysen, "Is War Obsolete? A Review Essay," p. 91.
- [22] Holsti, *International Politics*, 3rd edition, p. 68.
- [23] Robert Jervis, "The Political Effects of Nuclear Weapons: A Comment," in Lynn-Johns ed., *The Cold War and After*, p. 76, note 20; Kaysen, "Is War Obsolete? A Review Essay," p. 93.
- [24] 时殷弘:《新趋势、新格局、新规范》, 第401页。
- [25] 对全人类生存质量的最低标准的关切, 当前主要体现为对基本人权的国际关切, 参见 R.J. 文森特:《人权与国际关系》, 知识出版社, 1998年版, 特别是第三章; 张春、潘亚玲: "有关人道主义干涉的思考" [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7期。
- [26] 时殷弘、霍亚青: "国家主权、普遍道德和国际法——格老秀斯的国际关系思想" [J], 《欧洲》2000年第6期; 时殷弘: "论世界政治中的正义问题", 资中筠主编:《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M],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
- [27] "人类安全"一词自1994年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采用以来, 不仅为学术界广为运用, 而且为加拿大、挪威、泰国等不少国家奉为外交政策依据之一。关于"人类安全"观的新近评述, 参见 Roland Paris, "Human Security: Paradigm Shift or Hot Ai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2 (Fall 2001). 在中国, 精神气质与"人类安全观"相同的"新安全观"也颇为盛行。
- [28] 需要指出的是, 依据上文定义, 此处定义的时间段之前的诸多自卫战争、反霸战争等都不应被排除在讨论之外; 但应看到, 它们虽确具有自卫与反霸的性质, 但一旦导致这种自卫或反霸的威胁被击退之后, 先前自卫或反霸一方往往会"乘胜追击", 战争更多地仍是一种寻求生存必需的战斗。
- [29] 关于三十年战争, 见 Geoffrey Parker, *The Thirty Years' War* (London: Routledge, 1984); Miller, *Global Order*, chap. 2.
- [30] Zook, Jr. and Higham, *A Short History of Warfare*, pp. 126-127.
- [31] 霍尔斯蒂就将整个冷战时期称为"意识形态的时代", 见 K.J. Holsti, "Scholarship in an Era of Anxiety: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during the Cold War," in Tim Dunne et al eds., *The Eighty Years' Cris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19-1999*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39; 关于冷战时期持久的和平, 见 John Lewis Caddis, "The Long Peace: Elements of Stability in the Postwar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Lynn-Johns ed., *The Cold War and After*, pp. 1-44.
- [32] Edward Gulick, *Europe's Classical Balance of Power*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1967), chap. 2.
- [33] 关于均势的各种手段, 见 *Ibid.*, chap. 3; 对均势运用的经典分析, 见 Gordon A. Craig and Alexander George, *Force and Statecraf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chap. 3.
- [34] Kaysen, "Is War Obsolete? A Review Essay," p. 97.
- [35] H. E. Madame Louise Frechette,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at Fifty: Looking Back, Looking Forward," *Reports and Papers of ACUNS*, 1998 No. 3.
- [36] 关于革命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传统, 见时殷弘、叶凤丽: "现实主义·理性主义·革命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传统及其当代典型表现" [J], 《欧洲》1995年第3期。引语见巴勒克拉夫: 《当代史导论》[M],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年版, 第204页。
- [37] 时殷弘: 《新趋势、新格局、新规范》, 第393—398页。
- [38] 关于国际社会演变中的宽容与不容异己, 见潘亚玲: "变动中的国际社会: 宽容与不容异己" [J], 《国际论坛》2001年第6期。
- [39] Orme, "The Utility of Force in World of Scarcity," p. 145.
- [40] 时殷弘: "论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的被侵蚀和被削弱——全球化趋势的最大政治效应" [J], 《国际论坛》2001年第4期。
- [41] 关于相对安全与绝对安全, 见 Henry A.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57), Introduction; 关于国家主权的法理和实际的冲突, 见潘亚玲、张春: "现实主义、国际主义、普世主义——评有关主权的学说及其当代影响" [J], 《欧洲》2000年第6期。
- [42] 关于相互依赖与行为预期关系的论述, 见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59-64.
- [43] Orme, "The Utility of Force in World of Scarcity," pp. 166-167.
- [44]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17.
- [45] 关于科索沃冲突存在的伦理问题, 见时殷弘、宋德星: "科索沃冲突与国际政治伦理" [J], 《美国研究》1999年第3期。

作者简介: 潘亚玲, 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科社教研室讲师。(上海, 200433)

张春, 云南省国际友好联络会常务理事。(昆明, 650032)

收稿日期: 2002-03-04